

· 学术卷 ·

思想的力量

《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许明 段钢◎主编

自《社会科学报》创刊以来，尤其是改版之后，大量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思考与观点在这里交锋呈现，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大家、名家云集，既有理论层面的学术探讨，又有直面现实的个案研究，也不乏独抒性灵的人文情怀，彰显出《社会科学报》的重要思想平台地位。议题的超前、观念的碰撞，都昭示了思想的力量。

时值《社会科学报》改版十周年之际，特精选这十年来的重要文章，汇为《政经》、《学术》、《文化》三卷，以资纪念，以饕读者。



· 学术卷 ·

思想的力量

《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

许明 段钢◎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篇 / 003

公共理论——新时代下再读马克思 / 005

为社会主义和谐观一辩 刘世军 / 007

对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的再思考 冒天启 / 01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十年 俞吾金 / 022

苏联模式的失败令我沉思 高 放 / 028

革命的余波回荡百年 汪朝光 / 034

九十年领袖之路 许耀桐 / 040

辛亥革命百年：不仅仅是纪念

邓伟志 许耀桐 李 乔 / 046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左凤荣 沈志华 / 052

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片断中得到启迪

徐觉哉 / 059

社会建设——走向民主和依法治国 / 069

社会学系列论坛：转型中国

费孝通 宋林飞 关信平 陆学艺 / 071

城管与小贩的战争如何终结 **蔡定剑** / 080

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徐 勇 / 086

有效分权以实现主权在民 竹立家 / 089

崇高的信仰依托于好的社会 李向平 / 093

遏制部门争权，推进立法公平 盛 洪 / 097

名家专访——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 / 101

一个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 萧功秦 / 103

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

内森·加德尔斯 吴万伟/译 / 111

民族国家理论的悖论性发展 本报特约记者 / 115

监督式民主：民主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本报特约记者 / 121

东方社会的公民身份 本报特约记者 / 127

下篇 / 133

学术探讨——守护传统还是迎合西方? / 135

理论的原创及其批判方法 本报记者 / 137

汉语：突出外来语的重围 周振鹤 郜元宝 / 143

思想·学术二十年 夏中义 王家范 童世骏 / 146

在文学和历史之间…… 董健 丁帆 王彬彬 / 154

谁来陈述历史? 傅光明 / 163

学术移民：共筑上海文化高地

陈家琪 陈嘉映 王鸿生 童之伟 孙周兴 / 169

“后现代死了!” [英] 格雷厄姆·默多克 章戈浩/译 / 177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的缺位 徐思彦 / 182

跨学科研究应合乎学术发展内在规律 杨国荣 / 186

民俗是社会建构的重要元素 哈森 田兆元 / 190

学术批评——还学术一块净土 / 197

就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 曹树基 / 199

社科评奖问题何在? 周一平 / 204

学术期刊中的“三角交易” 王旭东 / 209

慎重对待“废伪”之争 江晓原 / 215

回归单纯 尤小立 / 218

“行政通吃”是学术发展的毒瘤 熊丙奇 / 222

谨防学术会议被异化 李醒民 / 225

教育批判——迈向现代大学之路 / 227

反省当代中国研究生教育

钱理群 陈思和 汪丁丁 谢维扬

高瑞泉 张汝伦 / 229

《中国大学评价》遭遇再评价 顾海兵 武书连 / 236

北大教改：一石激起千层浪 本报记者 林国荣 / 242

书院悄然逼近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 246

南方科技大学：“火车”驶向何方 袁伟时 葛剑雄 /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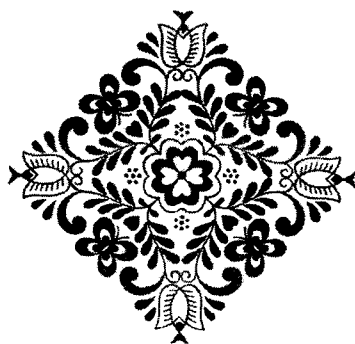
异地高考还有多远 张千帆 / 254

高校联盟酝酿新“圈地”运动 本报记者 /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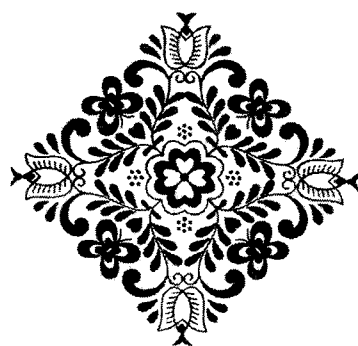
作为一面镜子的民国教材 罗时进 / 263

让大学学位证书回归本义 董 健 邓伟志 / 267

在《社会科学报》改版的这十年中，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成为一项重要工程，社会法制建设也逐步走向开放和现代化，全社会对民主、人民权利的理解越发成熟，人们能够自发自觉地关注民生问题和各类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进步。而理论与学术的研究，正是这个时代前进的先声。在传统与西方学术研究范式之间，中国学术如何抉择？中国学人如何取得自我突破？所有的这些疑问，其实都可以在本报的这十年来所刊发的文章中找到一些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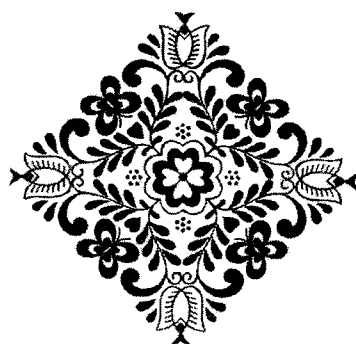
上篇



公共理论——新时代下再读马克思

21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将是由各国人民各自推进,兼程并进,和平渐进,携手共进,创造各具本国特色、异彩纷呈的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高放

苏联现代化的历史告诉人们,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力量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在衡量一种现代化方式是否成功时,不能只看几项指标,集中力量办的几件大事,更应该看这些措施是否惠及百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在推动社会向自由王国前进。——左凤荣 沈志华



■ 2005. 10. 20

为社会主义和谐观一辩

——与刘吉同志商榷

上海政治学会 刘世军



本报9月29日第4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同志撰写的《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大厦》一文,提出“贫穷不是和谐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无差别、无矛盾不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新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度、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开端与典范”等观点。本文作者就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与刘吉同志商榷。

“贫穷不是和谐社会”判断的提出,缺乏现实语境

《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大厦》(以下称《吉文》)提出“贫穷不是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套用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句式。邓小平同志以一个政治家的口气说这句话,并不是想给“什么是社会主义”下准确定义,而是在国民经济陷入将要崩溃的边缘,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针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针对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极其贫困的窘境,针对综合国力很低的状况,提出的一个政治判断,其目的是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那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而我们党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是针对“贫穷”,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呢?不是。而是在我国人均 GDP 突破 1 000 美元之后,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情况下,针对发展中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矛盾,收入差距拉大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深化改革与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矛盾;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不到位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问题的凸显,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才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要说什么不是和谐社会,应该是“发展不平衡不是和谐社会”、“收入差距太大不是和谐社会”,“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发展不是和谐社会”,“人民群众不能共享改革成果不是和谐社会”。

1993 年 9 月 16 日,退休后的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道,“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 1993 年到现在,10 多年过去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党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核心是解决为谁发展、如何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題,是解决“成长的烦恼”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无差别、无矛盾不是和谐社会”难以让人信服

《古文》提出,“和谐也不是小差别、小矛盾的社会,而是充满着此起彼伏的丰富多彩的差别和矛盾的社会”。这些提法都可以商榷。所谓的不是“小差别”、“小矛盾”究竟作何解释?要么是“大差别”、“大矛盾”,要么是“中差别”、“中矛盾”,如果说在“中矛盾”到“对抗性”矛盾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 3 : 1,这是中差距还是大差距?城乡之间是和谐还是不和谐?西方七国集团(即美国、加拿大、德

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人口占世界 11%,GDP 占世界 65%,而世界其余地区人口占世界 89%,GDP 仅占 35%,这是“中差距”还是“大差距”?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要缩小差距还是要拉大差距?笔者认为,差别越小、矛盾越少,社会才越和谐,而不是相反。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期盼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差别和矛盾越来越大的社会(非对抗之前),而是不断消除“三大差别”,消除因分工不同而造成的社会分化的社会。

执政党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用和谐的方式解决矛盾”意指什么

《吉文》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建立和谐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纵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残余,也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用和谐的方式去解决”。首先,关于“根本任务”的新提法笔者认为值得探讨,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的根本任务究竟应是什么?在党的文献中,虽然有“根本任务”、“基本任务”、“第一要务”、“重要任务”等不同表述,但还是有差别、有层次、有侧重的,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就是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和谐社会提出后,确实有人说,要把“根本任务”和“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这种观点在党的文献中是找不到根据的。显然,《吉文》把执政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表述为“建立和谐社会”是不够科学的。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构成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只能是党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不是“根本任务”。其次,“用和谐的方式”解决“阶级和阶级斗争残余”是不是科学?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通过民主与法治的途径来解决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对违法犯罪以及“阶级斗争残余”则是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以我之陋见,“法治的方式”与“和谐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今天的中国,对“腐败问题、下岗问题、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问题进行‘阶级分析’,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去煽情”是错误的,但是,能不能用“和谐的方式”取代“法治的方式”呢?不能。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就是“民主法治”,这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类矛盾的根本途径。正如《吉文》所言,“我们的同志千万要清醒,不要把和谐社会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 开端与典范”是惊人之语

《吉文》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新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度,新阶段’”,“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水平、新境界’”。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吉文》并未对这“六个新”作深入阐发,笔者对此不作过多评论。但把和谐社会判定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开端和典范,实在不能认同。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成果都是在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以来中国人的实践创造和智慧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尚未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原理高度,从最基本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实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了历史之先河”这些论断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是原理高度?什么是从最基本层面的结合?还期待作者能进一步阐述。

■ 2007. 4. 19

对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的再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贾天启



“恩格斯晚年”是一个时间概念,笔者将它界定为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这12年时间内。这段时间,恩格斯除了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外,还参加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撰写了不少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文章,也包括重要的通讯书稿等,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宝贵思想和理论。

笔者在几年前曾提出:要正确理解“消灭私有制”的含义,除了要弄清有关德文、俄文的翻译外,还应该重读恩格斯晚年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这几年,围绕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研究恩格斯晚年有关社会发展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引起了我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笔者把恩格斯晚年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概括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宝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笔者联系中国、俄罗斯转型的实践和理论的大题目,反复进行了学习和思考。

一、恩格斯晚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平过渡、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恩格斯晚年的大量时间用来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形成了我们 011



所熟悉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重要经济学著作。恩格斯自己也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撰写了富有战斗性的大量哲学、政治著作，比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5月26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等。另外，恩格斯联系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还撰写了大量的短文，比如：《卡尔·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还有许多通信，确立了他晚年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思想，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四点值得我们再思考：

（一）恩格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但这个思想，长期被我国思想界所忽视

早期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就是1847年12月—1848年1月所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以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满腔热情地支持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在这期间，马克思还编辑《新莱茵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1849年5月19日报纸被勒令停刊后，马克思又于1850年出版了四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他的《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其中有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很熟悉的论断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正是这一论断，成为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选举制度，恩格斯早期在提倡暴力革命时，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态度，他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选举制度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在实践中，普选制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恩格斯欣喜地说：“德国工人给与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应该怎样利用普选制。”（《马克思